

战略纵横

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核精髓

■张欣 邱剑敏 李元鹏

编者按

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丰富、意蕴深厚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安全理念和战略考量。其中，“大一统”的战略追求、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、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、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、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等，尤能体现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核精髓，今天仍具历久弥新的启示意义。

在漫漫历史长河中，中国历代有识之士无不重视安邦定国，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上不乏深邃思考和精辟论述，形成了绚丽多彩、各擅胜场的战略文化。这些文化从战略层面展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、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，蕴含着追求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，闪现着谋胜图强的战略智慧，对新时期理解把握国家安全问题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。

“大一统”的战略追求

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，在于始终追求和坚持国家“大一统”，表现为对国家统一的深层认同和持续努力，并成为实现政治安定、人心归附乃至国家崛起的关键。这一特征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，成为历代王朝制定安邦大略的思想基础。

《春秋公羊传》记载：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首次提出“大一统”概念；孟子主张天下“定于一”，认为如此方能“君仁臣义，君民同乐”。可见，“大一统”发端于先秦，最初侧重政治上的统一。随着统一文化的长期浸润，“大一统”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拓展延伸，成为传承中华文化、联结中国历史的关键。所以董仲舒讲到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”。传承后世，“大一统”逐步从政治、地理上的统一，上升到思想认同的一致，达到“人和”“壹民”的境界。今天看来，“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”的认知追求，利于集中整合国家资源，便于形成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。历史上公认的盛世，多在国家统一之后实现，如文景之治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，开元盛世在平定徐敬业乱，康乾之治在平定三藩之乱、统一台湾后，等等。正如《荀子》所言，“四海之内若一家，故近者不隐战能，远者不疾其劳，无幽闲隐僻之围，莫不趋使而安之”。放眼中国历史进程，尽管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替出现，但统一是主线，分裂或割据则是暂时现象。经

过数千年的文化交融、伦理教化、制度实践，“大一统”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战略追求，也成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观念，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动力，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和性格特征。

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

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突破，在于能够站在政治高度把握国家安全问题，较早挣脱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束缚。映射到安邦大略上，体现为重视安定国内民心、安抚四夷人心，以此维护国家长治久安。

早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，管仲率先提出“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”的战略主张，以“尊王攘夷”号召聚拢诸侯，获取了政治、军事双重胜利。此后，孔子提出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；孟子提出“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”，发出了以德安邦的文化先声。传至后世，这一战略文化为历代明君良将所接受，西汉名将赵充国在平定西羌之叛时，五次上书朝廷建议政治安抚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，终获平叛全胜。纵观历史，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因素不在山川险阻，不在兵革锐利，而在于采取的政治方略能否收获和安抚人心。因此，古人深谙“得民心而后天下安”的道理，注重政治清明、政策开明求内外安全稳定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古代先哲强调以德安邦的同时，从未放弃或排斥正义战争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，孔子对君主四处武力征伐明确持反对态度，但当卫灵公询问可否征伐叛乱的蒲地时，孔子表示同意；在齐襄公是否应向纪国报九世之仇的问题上，孔子表示赞成。这说明，先贤反对兼征并伐和穷兵黩武，但并不反对以战止战，并不反对伸张正义。可见，以德安邦的核心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制定安全方略，绝不意味着妥协和退让。为了维护国家安宁和统一而诉诸的正义战争，也是以德安邦的应有之义。

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

文和武是我国古人提出的一对重要范畴，其内涵丰富、意义深远。从国家安全角度看，文是指政治、文化、外交等非军事手段，武则特指军事手段。古人很早就认识到，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利于达成战略目标，主张通过文、武两个方面共同发力。

《逸周书》有言“内事文而和，外事武而义”，首次提出文武相对的概念；孔子讲到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”，深入论证了文与武的辩证关系；《吴子》记载“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；有扈氏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”，反映了一味崇尚文治或单纯倚仗武功必然走向覆灭的历史规律。这些古代著述，揭示了文武相资方能巩固国家安全的道理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汉高祖刘邦以武力夺取天下后，重视武备而忽视文治，大臣陆贾劝谏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、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”刘邦听取了陆贾的建议，文治与武备双管齐下，由此将国家发展引入正轨，成为历代治乱成规的安邦大略。诸葛亮提出“治国以文为政，治军以武为计”，认为文与武都不能单独存在，主张文武并用、相辅相成。唐太宗总结治平经验，曾说过：“朕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当以德绥海内，文武之道，各随其时”，认为乱世须用武力谋统一，承平须靠文治保周全，深化了文武相资的认识。同时，古人特别强调合理把握文武相互关系，既不重文轻武，亦不重武轻文，避免出现穷兵黩武或偃兵息武等极端情况，二者相得益彰方能产出最佳效益。

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

中国古人很早就从战略高度理解经济与军事的关系，认为经济实力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必要条件，国防强大才能长久实现经济发展和民众安宁，从而形成了富国强兵的战略文化。

春秋时，《国语·齐语》记载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，其“国富者兵强，兵强者战胜，战胜者地广”的战略主张，为齐国争霸奠定基础；战国时，《商君书》提出“兵不强，不可以摧敌；国不富，不可以养

兵”，体现了古人对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辩证认识，反映了传统战略文化的不断延续。进入封建社会后，历代王朝立足国家经济基础，通过“兵农合一”将富国强兵落到实处，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。三国时期，面对军粮匮乏，要靠采桑植蔗和蛤蚌为食的严峻困境，曹操采纳毛玠等谋士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，蓄军资”的建议，在建安元年发布屯田令，通过民屯、军屯等途径解决军队粮荒和百姓负担问题，实现了“百姓亲附，甲兵强盛”。应当注意的是，形成这一战略文化的深层原因，还在于民众富足不仅是强兵胜战的先决条件，也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。秦汉以来，历代王朝均建立在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之上，如果农民大量破产必然带来流民大量滋生，必将严重危害社会安定，甚至引发社会动乱。因此，只有保护、安顿好自耕农阶层，国家才能巩固安宁。如唐贞观时期，魏征主张通过轻徭薄赋、劝农务本来获取国家安定，体现了民安国安的战略智慧。

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

立足于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，中华民族从生存发展的全局利益、长远利益出发，较早地超越了战争视野的局限，把安国全军作为国家安全的至臻追求和最高境界，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传统战略文化。

战争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，安国全军的理念最早出现于血流漂杵、万骨枯朽的先秦征伐年代，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战争的深刻反思。儒家把战争与斋戒祭祀、疾疫置于同等地位，强调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；道家认为“兵者凶器”，不得已而用之；兵家认为“兵者，国之大事”“非危不战”，强调“安国之道，先戒为宝”，等等。以上认知，主流思想是重战、慎战和备战，其文化内核为历代王朝所认同和接受。楚汉战争中，韩信采用谋士李左车“先声后实”之策，未动一兵一卒收复燕国，为楚汉争雄增添有力砝码；东汉统一战争中，汉光武帝刘秀先后近远、逐步进取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；西晋时，晋武帝司马炎注重训练军队、制造战舰、筹措物资，经过10余年准备最终成功灭吴，反映了谨慎用兵、全国为上、全军为上的战略理念。今天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，更须以时代精神激发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生命力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。

现代战争不确定性与制胜之道

■郭呈洲 赵中其

谈兵论道

不同时代的战争有不同的特点，而与之相伴的“战争迷雾”也在不断变幻。往往当人们通过多方探索，感觉已经基本看清其中的制胜之道时，下一场战争又呈现出新的不确定性。叙利亚战争、亚阿冲突等局部战争，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现代战争的多面性、复杂性。可以看到，传统火力战虽仍在舞台上，但智能化特征已然显现；作战类型虽仍为攻防争夺，但作战指导、环境条件、具体打法已深刻变化。战争正加快向智能化演进，战场空间由陆、海、空、天、电、网向太空、极地、深海、认知等全域对抗拓展，博弈比拼由军事对决向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舆论等多维较量转变，参与力量由交战双方向全球关注、多元介入方向发展，信息智能由辅助支撑向全面主导、全程贯穿、全域覆盖迈进，作战单元由规模集约向小微精英、形散能聚演化，智能、混合成为基本趋势。面对嬗变中的战争和新的不确定性，需要敏锐知变、积极应变，于变中蓄势，变中进取，实现领先超越、抢得制胜先机。

基于战争“泛变”增强超限混合性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，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。智能化时代，看得见的争斗和看不见的斗争并存，有硝烟的战场和无声息的争战同在，灰色地带、混合战争、边缘冲突相伴而生。面对激烈复杂的竞争博弈态势，需要加快构建以军事为基石的混合战争体系。首先，丰富战略选项。紧贴时代特点，加强非军事抗衡特点规律探究和力量手段建设，做实相关准备，形成综合优势。其次，提升隐形实力。重视做好地缘、文化、心理等方面研究，通过智库交流、学术推介、文化交融、法律构建、媒介宣传等方式，形成有效话语体系，在润物无声中影响对方认知。再次，团结和平力量。把构建新时代统一战线作为混合对抗的重要手段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增强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。

基于战场“智变”增强战法灵活性。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冲突，囿于地域维度、双方实力等因素，传统作战痕迹仍较为明显，但智能化、无人化已不可逆转地走向前台。可以预见，全面智能化战争并不遥远，武器装备的延伸范围将更广泛，对抗双方的交战视角

行弹性编制，不固定员额、不限制领域，超前试验论证先进作战理论、新式作战编组、新型武器装备，为实现打击链条末端云作战、云联合、云聚能、自组合运用探索路子。

基于威慑“衍变”增强战略保底性。威慑与战争一样历史悠久。随着智能化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深入运用，威慑的内涵外延、力量手段、形式效果等都在发生变化。虽然传统的核威慑仍是保底基石，但新的威慑能力已在悄然形成，对决心、实力、智慧、谋略等要求更高。着眼发挥威慑平战阻敌于无形、危时控势于关键、战时决胜于最后的作用，应注重固强补弱、开拓新域、长期经营，实现威慑战略价值最大化。首先，坚持常规与非常规并重，加快发展新型武器、新质力量，通过实战化演训、实战化部署，辅以谋略意志表达传递，达成预期威慑目标。其次，持续研究新作战概念、新作战理论，通过学术交流、智库碰撞和多轨多层对抗，推动理论由“软”变“硬”，转化为现实威慑力。再次，加快科技向军事领域转化进程，在云计算、区块链、量子科技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，努力形成对对手的潜在威慑。

语言对抗的传统样式，是斗争双方在特定时间、特定背景下，围绕特定议题或者目标，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媒介的博弈形式。在认知域作战背景下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、现代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、新兴社交媒体的推陈出新，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提高，再加上人类在认知科学、语言学、传播学、心理学等领域取得的新进步，人们对于语言对抗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全新的认识。

语言对抗日益精准化。话语的叙事方式是影响认知的关键。智能化时代的认知域作战，可以对受众开展基于大数据分析，通过大量文本收集和挖掘，寻找以往因人工力量受限而看不到或易被忽略的各种观点、倾向、立场及诉求。运用好认知计算，可以更好地选择语言种类、语态模式、话语技巧、叙事设计，优化叙事的视角、主题、风格以及叙事所蕴含的个人情感、价值观念、意识形态、立场评价，更好地顾及不同语言文化传播模式的差异，从而实现最好最优最快最精准的打击和反击。同时，也能够有预见、有针对性地做好认知防护。

语言文本设计定制化。认知域作战从根本上说需要利用信息来施加影响，其信息文本所采用的独特性话语是认知影响的主要依托。针对特定国家、特定地域人群的认知域作战，要娴熟运用对方语言文化中的话语表达形式，深入研究对方语言表达的故事、神话、谚语、格言等，特别是对方社交媒体上流行的话题、人物及其话语特点，善于运用跨文化认知的地道而新颖的语言表达，营造富有感染力的情感认同语言氛围。在此基础上，努力做好创新表达，充分把握对方受众的不同认知和需求，组织多维话语力量、设计多种语言文本，使之依托认知共鸣形成新的印象和认知。

语言主体风格大众化。语言是认知域作战“射向思想的炮弹”。富有创意、充满表现力、符合现代传播规律的语言运用，可以覆盖广泛的人群、争取更多的受众。因此，实现语言主体风格大众化，是决定认知域对抗成效的中心环节，也是在认知域作战中赢得认可、赢得人心的关键因素。年轻人是未来战争中最活跃的人群，也是认知域对抗的主体力量。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，是获得认知域语言对抗优势的关键。

语言对抗效果模型化。认知域作战的语言对抗要深入研究对手的主要文化环境、主要认知叙事模式、主要认知短板和弱点以及社交媒体的传播话语特点，掌握其长期形成的认知模式、文本表达的内在规律等。基于人工智

能，对语言对抗作用于不同人群产生的认知效果进行建模分析，有助于及时展开效果评估，准确把握潜在问题，发现力量支点。比如，一般定性模糊评估难以把握个人灵活机动的微小传播作用以及单个“话语狙击手”的点射作用，采用建模分析手段则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结论。此外，建模分析还可以为语言对抗创造长远与当下结合、宏大主题与微观主题结合、议程设置与随机传播结合、滴水穿石与大水漫灌结合、包容隐忍与积极释放结合的战略统筹手段，更好地发挥语言对抗的战斗力。

(作者单位：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)

“认知域作战”纵横谈

指挥员须有“成本”意识

■周文况 冬

群策集

经济学理论认为，个体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会用最小的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。“成本”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诸领域，军事领域也不例外。这就提醒指挥员应注重培养“成本”意识，熟谙并用好“沉没成本”“机会成本”“边际成本”等思维理念，有效控制作战投入，不断提升作战效益。

减少“沉没成本”。沉没成本是以往发生的，但与当前决策无关的成本。在许多社会活动中，经常由于之前投入太多，决策时出现“不舍得放弃”的情况，导致追加投入，沉没成本越来越多。此时，敢于放弃、及时止损往往是最佳选择。当然，有时候面临不利战局时选择放弃需要极高的胆识和魄力，如果一味蛮干，只会增加沉没成本，带来更大伤亡。未来作战中，一方面应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，精准指挥、精确行动，尽量避免作战决策失误带来沉没成本；另一方面，战场态势瞬息万变，作战决策失误产生沉没成本似乎又不可避免，加之战场形势紧急，容易造成左右为难的局面，此时，应力避“感情用事”，防止一意孤行，盲目“添油”而导致更大失败；冷静思考，果断决策，适时调整或放弃原有作战计划，将损失降至最低，保存实力择机再战。

算清“机会成本”。机会成本，又称选择成本，是指在取舍决策中，为得到某种利益必须放弃其他利益。任何决策都需要比较后择优，而一旦比较离不开机会成本，所以只要有决策就有机会成本，是否会计算机会成本也是区分决策优劣的重要标志。在一江山岛登

陆作战打响之前，有3个备选方案，仅有少数人支持先打一江山岛。张爱萍将军反复权衡，认为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，如攻占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，沉重打击和震慑大陈岛守军。最后，作战进程的发展验证了这一决策的正确。在未来作战中，要认识到有决策就有机会成本，应始终着眼实现作战目的，全面准确掌握战场信息，客观分析敌情我情，准确判断作战进程，既关注军事力量装备等显性成本，也不能忽视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长期的隐性机会成本。要善于制定多个作战方案，合理分析方案价值，在多个方案中择优选取。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，应借助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量化分析，准确计算作战方案的机会成本。

用好“边际成本”。边际成本是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花费的成本，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，边际利润为零，此时收益最大。打仗离不开火力打击和兵力突击，火力打击盲目使用过量的火力覆盖，效果不一定好，很容易造成浪费。兵力突击一味追求“韩信点兵，多多益善”，当兵力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，增加投入也收效甚微。由此可见，兵力火力等投入越多，未必收益高、效果好。在未来作战中，指挥员应认清各军兵种作战力量的特性，尤其是把握新域新质力量的独特性和稀缺性，既不过度使用，也不闲置浪费。要注重把握战场容量和兵力火力密度，充分利用边际成本特性，找准兵力火力运用的边际成本利益必须放弃其他利益。任何决策都需要比较后择优，而一旦比较离不开机会成本，所以只要有决策就有机会成本，是否会计算机会成本也是区分决策优劣的重要标志。在一江山岛登